

關於《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考察

——作為國民革命基軸的國共合作的一個側面——

狹 問 直 樹

中國國民革命是一九二〇年代世界史上的重要事件。衆所周知，推動國民革命的原動力，來源於孫文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合作的成立。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國共合作的成立大會，而一大宣言猶是國共兩黨的共同綱領。

國民黨一大宣言一直是公開的宣傳性文書。但是，臺灣版《國父全集》所收“一大宣言”（本文所稱《校正本》）和大陸版《孫中山全集》所收“一大宣言”（《祕書處本》）之間，有相當大的不同。即《校正本》中所刪掉而《祕書處本》中却有的兩段文章。其一是，第二節“國民黨之主義”中民生主義一項內的兩段文字，其二是，第三節“國民黨之政綱”中的對內政策第八條全文。

除了這兩個版本以外，還有幾種“一大宣言”的異版。本文第一章，是說明宣言草案的制訂過程，其中包括一月二十三日議決的宣言《二十三日決議本》以及大會期間兩次修正宣言的問題。二十四日議決修正，出現了《二十四日修正本》。而三十日的會議通過了沒有正式成文的追加了三項內容的提案。

第二章旨在探討在大會之後刊印的《祕書處本》以及它存在的問題點。它含有不合適大會決議的部分，其中最為引起大家關心的就是與《校正本》所沒有的部分有密切關連的地方。批判者們指責《祕書處本》的改竄問題；另在廣州出現了宣言的《廣州本》，上海出現了《上海本》。

第三章是說明國民黨二全大會與“一大宣言”的繼承關係，以及《校正本》的性質特徵。二大強調表明“無修正”地繼承“一大宣言”的主義和政綱，可是《二大本》其實却完全不同於以前出現的各種版本。《校正本》自稱“國民黨中執於一九二四年四月校正”，而它一定是於一九二六年四月西山派二大以後所制作的。

之所以出現如此多種的“一大宣言”，其原因在於《祕書處本》對大會決議的改竄。可是，我們同時要注意到批判這種改竄的其它諸本所存在的問題更為嚴重。現在，我們應該承認：“一大宣言”首先是以《祕書處本》的面貌出現的，而後其它各種“一大宣言”的問世，則反映了當時國共合作內部的複雜的情形。各種版本內容的異同表現出國共合作隊伍中對於國民革命的各種不同的觀點。如果只把其中某一版本的宣言視為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代表，那麼我們便可能有失於對歷史原貌的把握。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伐開始以後的實態

北 村 稔

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將汪精衛排除出權力核心。並於七月就任總司令，開始北伐，目標是統一全國。

蔣介石爲了掌握政治權力的核心——黨的權力，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新設了過去黨規中所沒有的主席一職，並由自己就任。可是，這個主席一職，是以暫訂爲條件而設置的。汪精衛雖說是離開了權力核心，却仍然繼續保有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只是前往歐洲短暫外遊而已。蔣介石並沒有完全建立起他個人的獨裁體制，暫設主席一職，是國民黨內懼怕蔣介石軍事實力的各派及共產黨，在妥協之下的一時權宜之計。

北伐開始後，國民黨內各派與共產黨，一方面承認蔣介石軍事指導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開始要求作爲政治指導者的汪精衛復歸。蔣介石則和共產黨交涉，發揮巧妙的政治腕力，阻止了汪精衛的復歸。就共產黨全體而言，對蔣介石依然保持着妥協的態度。

一九二六年十月，國民革命軍佔領湖北武昌之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中心從廣州轉移到了武昌。國民黨內各派與共產黨在新的狀況下，爲了推翻蔣介石的獨裁，開始採取共同的行動。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有蔣介石、鮑羅廷，及其他國民黨要人參加的會議，以此爲分界點，武昌的反蔣介石集團，和南昌蔣介石之間的權力鬭爭，終於表面化。如此一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大轉折便終於出現了。

本文針對從北伐開始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止這一期間第一次國共合作內部的複雜政治關係進行分析，對於有些問題的定論加以批評。

瞿秋白與國民革命

江 田 憲 治

一、一九二三年一月瞿秋白從蘇俄回國，開始在中共中央從事理論方面的工作。當時其工作重點是推進國共合作，他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促成了反帝聯合戰綫；中國無產階級雖弱小且幼稚，但其力量必將隨着資產階級的發展而壯大；沒有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民族革命便不能成功。這些論點和陳獨秀是一致的。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根據陳、瞿等人的見解，決定全面推進國共合作。但同時，陳、瞿之間在革命理論上亦有不同之處，不過在這一階段尚還沒有表面化。

二、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期，瞿秋白作為激進的反帝民族運動宣傳家，鼓吹廢除不平等條約，批評資產階級的妥協行動，提出組織民衆、聯合社會各界、以及建立人民武裝的問題。他通過五卅運動的經驗認識到與民族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必要性。這些主張反映在中共中央以國民會議和軍事行動為中心的戰略方針中。

三、但到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二大和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共產國際強迫中共採取了退讓政策，結果使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勢力受到很大打擊。在此情況下，瞿、陳之間理論上的差別發展到政治上的對立。持樂觀態度并相信工農力量的瞿秋白主張在革命戰爭（北伐）中爭取革命領導權。不得不承認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陳獨秀却堅持以國民會議方式，培養國民黨左派，設想以這種方式取得間接的領導權。這種對立使瞿秋白在中共中央處於孤立狀態。

四、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時期，瞿秋白寫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批評陳獨秀的得力幫手彭述之和中央的政策。據他說，彭述之主義乃是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孟什維克主義。這種斯大林式的批評大都是不合理的、忽視事實的。瞿秋白在本這小冊子上還預見到蔣介石將會發動政變，主張：放棄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策；創立國民革命的蘇維埃；以“一次革命”來達到社會主義。其主張和革命論，其實和瞿本人曾大肆攻擊的托洛茨基的主張如出一轍。

瞿秋白的革命論，雖然表面上支持共產國際、斯大林，但實際上是個中國的托洛茨基理論。瞿秋白不能自覺地認識到這一點，是他的悲劇。

康有為與吳佩孚

——試論國民革命時期的康有為——

竹 內 弘 行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七年是康有為一生最後的八年，其間有幾年正處於中國國民革命時期。這八年間，他也曾發表了自己的政治意見，并且經常往來各地向軍閥頭目進行游說。一九二三年駐紮洛陽的吳佩孚，是當時最有實力的軍閥頭目。康有為跟他見面以後，在一段時間里，兩人意氣投合，常常共同行動。這個事情，好象在當時的社會上成爲一個帶有衝擊性的新聞。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二日，吳佩孚五十歲生日時，有一千多賓客來到洛陽爲他祝壽，送了很多壽禮。康有為也送了一副壽聯：

牧野鷹揚，百歲功名纔半紀，
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

但吳佩孚生日當天，康有為沒能來洛陽。根據康有為的一封信的手稿來看，他是在吳生日半個月以後才去的洛陽。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間。

康有為去洛陽的目的是什麼？根據我查的兩種回憶錄（一個是張鈞寫的《風雨漫漫四十年》，另一個是日本人岡野增次郎寫的《吳佩孚》），康有為急切要求吳佩孚南下討伐孫中山的廣東政府。但是吳佩孚只與他談中國文化的問題，沒有答應他的要求。

那麼，康有為與吳佩孚交往這個事情有什麼意義呢？我首先要考察吳佩孚對儒教文化感興趣的理由。當時北方政府面臨各種矛盾。例如，國內工人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曾已爆發過二七慘案。看來，吳佩孚不能採取康有為的用武力解決矛盾的意見，因此而希望通過和平統一的方式來進行圓滿解決，他便想跟康有為談傳統儒教思想，特別是大同世界實現的方法。

但是，他們若想利用儒教思想的話，將會受到限制。因爲，儒教道德有五倫，其中「君臣之義」，中華民國的成立就宣告了它的過時，不過，吳佩孚認爲「長幼之序」即晚輩要服從長輩，可以代替「君臣之義」。這是社會秩序的決定因素。所以一九二三年長輩曹錕用不正當手段當上了總統，吳佩孚也仍然沒有離開曹錕。這件事跟康有為自始至終一直主張侍奉清廢帝，利用軍閥搞近代化和謀求中國安定一樣，在當時使很多人失望。

結果，他們兩人的希望都落空了，打了敗仗。可以說，在國民革命時期，他們相互依賴所做的努力，只不過是黃梁一枕。

地域史中的廣東農民運動

蒲 豐 彥

從辛亥革命到二十年代，希望改革社會的青年們一步一步地接近民衆。在這條道路上中國共產黨獲得了空前的成就。他們廣泛發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幾經曲折，最後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

現代中國的民衆的歷史，其重要部分表現在共產黨的歷史裏面。可是，我認爲共產黨的歷史和民衆的歷史却是兩件事情。這篇論文的目的在於，從海陸豐農村的歷史來看，二十年代的農民運動對當地農民（不是對中國革命）有什麼意義。

這裏，我以械鬥爲綫索來研究這個題目。在舊社會，廣東和福建等地方經常發生鄉村之間或者宗族之間的武裝爭鬥，這就叫做械鬥。械鬥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大鄉（大族）和小鄉（小族）之間的爭鬥比較多。而且爭鬥發生時，小鄉小族往往聯合起來抵抗大鄉大族。

海陸豐也有很濃厚的械鬥的傳統，前清後期出現了“紅黑旗”。傳說海陸豐的鄉村分成“紅旗”和“黑旗”，衝突一旦發生，各旗的鄉村就分別地聯合起來，發展到紅旗和黑旗之間的大械鬥。

海陸豐的基督教的歷史也包含大鄉大族和小鄉小族的問題。有些小鄉小族爲了避免大鄉大族的壓迫而全鄉全族整個兒入教，以求教堂的保護。

二十年代的農民運動是怎樣進行組織工作的？我認爲是從小鄉小族開始的。因爲這些弱者最需要援助而且最容易接受農民協會的思想。另一方面，地主尤其是大地主一般可能在大鄉大族裏。那麼，如果發動小鄉小族來對抗大鄉大族裏的地主，鬭爭的結構就很像械鬥。我們可以說，二十年代以前的鄉村之間、宗族之間的社會關係可能影響到農民運動的開展，而且農民協會的鬭爭方法對農民並不是完全新鮮的。

我這裏提出的只是一種模式化的典型。可是，如果從地域史的角度來進行這樣的研究，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會顯出另一個面貌。

關於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會（1925—1927）

水 野 直 樹

一九二五年七月，被壓迫民族聯合會在廣州成立。這是在中國國民革命走向高漲，五卅運動興起的歷史背景下發起成立的國際組織。其目標是支援國民革命、打倒帝國主義、爭取亞洲各殖民地的解放；其成員是中國人以及當時住在中國的一些印度、越南、朝鮮等亞洲各國人，其中包括來自緬甸、泰國、臺灣的代表。

這個約有兩百名會員的國際組織，得到了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的大力援助。核心人物有鮑惠僧，許甦魂等中共黨員，以及越南人胡志明，朝鮮人姜世宇等。雖然不可否認聯合會往往為中國一方之意圖所左右，但也注意到保障參加該會的亞洲各民族的獨立性。聯合會所組織的活動有，組織住在中國的亞洲各國人對於壓迫的抗議，參加和支援國民革命，以及對世界的革命運動的支援。比如，曾經開展了援助朝鮮獨立運動的活動，發表過一些聲明，參加過一些集會。聯合會的活動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廣州發生反共政變為止。可以說，聯合會的存在和上述各種活動，顯示出中國國民革命與亞洲各被壓迫民族的共同命運息息相關，不可分離，同時以一種具體可見的形式表現出那場中國國民革命所具有的國際意義。

與廣州的聯合會幾乎同時，在上海也有籌組被壓迫民族聯合會的動向。此前一直從事中韓互助社運動的朝鮮人呂運亨、中國人吳山等是其核心人物。上海的聯合會雖未正式成立，但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呂運亨與胡志明（以及印度人代表）作為來賓出席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在會上發表了演說。聯合會的運動得到中國方面的很大歡迎。

隨着北伐的進展，以及國民政府遷往武漢，一九二七年一月，在武漢也成立起“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會”。除中國人之外，以往在租界工作的印度人幾乎都參加了進去，還有一些朝鮮人，越南人也加入了聯合會。朝鮮人中，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官學校）武漢分校的學生，還有以獨立運動家而著稱的金奎植也加入了該聯合會。武漢的聯合會雖然只在一九二七年一月至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之前這段極短的期間內存在過，但却同廣州的聯合會一樣，由於體現出亞洲各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奮鬥的意圖而具有重大意義。

此後，武漢的聯合會遷往南京，可是已經名存實亡。體現出在大致相同的狀況及命運的基礎上、有共同奮鬥之意圖的亞洲被壓迫民族聯合會運動，亦隨着中國國民革命的結束而告終。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石 川 禎 浩

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後來得到蘇聯、共產國際等强有力的支援，到一九二一年七月結實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

五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和當時的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盛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例如，在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朋友陳溥賢（當時為《晨報》駐日本特派員。筆名：淵泉）、以及以河上肇、堺利彥為首的日本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給他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此外，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上海知識分子的言論也和日本言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戴季陶通過書信，和堺利彥一直保持着比較密切的同志關係。直接參與過建黨活動的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人的言論活動也是主要依據日語的社會主義文獻。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是在一種“邂逅”中發生的，即日本“大正德謨克拉西”時期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盛行和五四時期中國言論界“過激化”的邂逅。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除了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以外，還給中國的改革運動帶來了一種知識結構的變化，即此後，通過外國文獻接受的社會主義學說首先在言論界裏，其次在宣傳活動裏，最後在政治運動的實際過程裏，變為證明各種言論行動的正當性的依據了。

維經斯基來華（一九二〇年春）以後，蘇聯、共產國際的影響經過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傳入到中國，逐漸代替了通過日文書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情形。但是，社會主義運動的隊伍裏仍然存在着以掌握國外革命理論為先導的精神結構。這表明，在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有關革命的知識是指導革命運動的必要條件。因此，到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為止，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社會主義運動中產生了以“知識與指導”為內容的共產黨特有的屬性。

後來在國民革命時期，當那種有關革命的知識直接與蘇聯、共產國際發生關係時，不但在經濟上、組織上，而且在思想上也貫徹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和支配。追求解放的知識（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它變為一種以真理自詡的思想體系的時候，却同時孕育了以這種知識作為新的專制統治工具的危險性。

本文為了具體了解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情況，附錄了《中國社會主義關聯書籍解題（1919—1923）》和《日中社會主義文獻翻譯對照表》兩篇注文。

周 劍 雲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上海知識分子——

小 野 信 爾

在上海，有不少教員，新聞記者，編輯等知識分子參加了五四運動，他們不但直接間接地支持上海學聯的鬭爭，而且對各路商界聯合會，工商友誼會的成立，推進以平民教育為首的各種啓蒙運動作了有力的貢獻。他們的功勞應該受到公正的評價。遺憾的是因為他們大都是二流知識分子，所以在史料中很難找到了解他們思想情況的端緒。唯一的例外是當時作為戲劇評論家和出版公司新民圖書館編輯的周劍雲。從一九二〇年五月至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自己主編的『解放畫報』上，以婦女解放問題為主寫過大量的文章，表白了自己當年的思想。他的五四前後的活動和主張也比較清楚。

一九一四年以後，周劍雲志願通過新劇致力社會教育而奮鬥過一段時期，中途受到挫折。以後在學生愛國運動和新文化、新思潮的刺激下，重新進入出版界。那時正值五四運動的興起，他不但積極參加在上海的運動，而能擺脫狹隘民族主義和鴛鴦胡蝶派的藩籬，成長為一個堅決的民主主義者、啓蒙運動家。發行『解放畫報』，號召婦女自立，主張廢除大家族制是他具體的實踐活動之一。一九二二年，他着眼於電影在社會教育上的作用，和盟友鄭正秋等人一起參加明星影片公司的創辦，並擔任經理。以後的他不是一個文化工作者，而是一個為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而傾注了心血，有才幹的經營者。當然，自此以後他用文章來表白自己思想的機會也就很少了。到了三十年代，在他的主持下，明星公司聘請左翼文化界、電影界人士，合作攝制了多部有益的電影問世。這是衆所周知的事情，而這是同他為了救國、救亡，一貫地追求進步的態度分不開的。這些事情，用一般的善於見機行事的資本家標準是無法解釋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探求明星公司創辦以前的周劍雲的活動和思想。通過周劍雲，也可能推測出各個時期內同他緊密合作的一群「中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

冰 心 與 “大 海”

——冰 心 試 論——

菽 野 脩 二

謝冰心是一位從事文學活動達七十年的著名作家。但她持續不斷的文筆活動，並非一帆風順。我們翻看一下對她的作品的評論，就會發現對她的評價漸趨低下，我認為，她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

一九二一、二二年，《小說月報》雜誌上共登載了九篇對她的作品的評論。直民（沈澤民）、劍三（王統照）等人的評論，都是對她作品中表現的“愛”表示贊賞，贊揚“愛”之哲學，並想以此教育年輕人。從一九二三年成仿吾在《創造季刊》雜誌上發表評論以後，大家開始議論“愛”的抽象性，不確實性等。黃英（錢杏邨）、賀玉波等人的評論就批評冰心“對於社會太盲目了”，並要求她“研究研究現社會的組織吧”。一九三四年，在《文學》雜誌上發表的茅盾的《冰心論》，是一篇值得一讀的好評論，持論比較公平，比較深刻。但是對“大海”——大海怎樣影響到冰心的作品——這一點，茅盾也沒有深刻的了解。

冰心通過表兄劉放園的關係，在《晨報》副刊上首次發表《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一文後，又在該刊陸續發表了不少散文、小說、詩歌等。通過她的這些早期作品，我們能發現在其全部作品裏貫穿着的選用時事題材、依靠公理從傍觀者角度看問題等特徵。她使自己置於傍觀者的立場，選用時事題材構成一篇故事，通俗地展開一幅幅畫卷，以此告訴讀者，雖然人生充滿悲涼，人却依靠“愛”不得不活下去。她的作品在當時情況下，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新鮮和優異。比如說，《超人》這篇小說表現了人和宇宙（自然）的關連性。

這使我們感到人和自然交感的神祕的瞬間，這也可以叫做“生存感”。這個“生存感”就是冰心的文學性。《寄小讀者》《南歸》《相片》等作品都充溢着“生存感”。特別是《相片》這篇小說，以時光流逝來表現“生存感”，就是她的代表作。她有許多喜歡“大海”的文章。比如說，在幼年時期，她有時獨坐在石階上，對着大海整整坐了三個小時。她一定會感覺到大自然的生命力。讀了這些文章，我們才能知道她的文學是來源於“大海”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她和丈夫吳文藻曾經一起順路來過東京，從此日本的學者才開始評論她的作品。在軍部壓制言論的情況下，只有她的作品是由部分學者開始翻譯成日文的。這是很值得考察的事情，但是在此暫不贅述。

中華民國時期近代學制的普及與私塾

——以江蘇省為例的研究——

新 保 敦 子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發生以後，近代學校開始普及。有一部分私塾轉變為近代小學。此外有一部分私塾既便是在民國時期也仍然存在。本文旨在分析江蘇省無錫縣私塾的概況，塾師，及其與近代小學的關係。

民國時期，政府對水平較高的私塾採取獎勵措施，而取締質量低的私塾。據一九三五年全國私塾調查，那時全國私塾總數為八五二九一所，其中以江蘇省私塾總數最多。

無錫縣近代小學的普及比較順利，但是從一九三五年無錫縣私塾的調查來看，仍共存有五〇七所私塾。

關於私塾的分布，私塾一般設置在偏僻的農村。但在城裏也有相當的數量。

關於塾師，不少的塾師畢業於近代學校，尤其是中學。民國時期江蘇省的中等教育已相當發展，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較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就作塾師。

關於私塾的創立年代，不少私塾是民國時期新辦的。有些私塾採用分班教學。不少私塾其實相當於近代小學。

民國初期，雖然私塾妨礙了小學教育的普及，但是一九三〇年代以後私塾從某種程度上也成了近代學校制度的基礎。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隊占領無錫縣城時曾禁止開辦私塾。但是抗戰勝利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私塾對無錫縣的教育都很有影響。

爲什麼在江蘇省會有很多的私塾呢？其原因是：第一，清末江蘇省就已經有大量私塾存在。第二，江蘇省有很大數量的學齡兒童，但是小學校不夠。第三，因爲找工作難，不少的中學畢業生作塾師。第四，蘇北地區很窮，不能維持小學校教育。第五，對官方的反感。清末在中國各個地區都發生有毀學的暴動事件，而江蘇省與浙江省是毀學暴動發生最多的省份。說明當地老百姓反對近代學校，支持私塾這種傳統教育方式。

中國初期合作社史論

菊池一隆

中國合作運動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各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例如，一九二三年以後的華洋義賑會信用合作社的組織化，三〇年代以江蘇省為中心，合作社迅速擴大以及向各省的波及，蘇維埃地區、邊區合作社的推行，七七事變以後中國的『工合』運動等等。這是在分析中國近現代史時，不應忽略的題目。可是戰後對合作運動的研究却極少，處於遲遲沒有進展的研究狀態中。

本文研究辛亥革命前後至一九二三年期間的合作運動，並將這個時期定名為『初期合作社』時期，着重探討海外的合作社思想在中國的傳播，以及經過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最初的合作社組織化的進展情況。

結論是：(1)最晚也在一九一二年與合作社思想傳入的同時，以實踐為目標，形成了組織化的初步基盤。(2)關於合作社的形式，消費合作社主要是採用英國的羅虛臺爾式，信用合作社主要是採用德國的休爾志、雷發巽兩式，生產合作社則受到法國的影響。(3)參與合作社活動的人員，大多是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具有經濟救國思想的《平民》派，以他們為中心的集團進行實踐。(4)合作主義做為一種獨立的思想形成，它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不同，而且消費、信用兩合作社的優先的見解占多數。(5)探求與國際合作運動的聯繫，從它們的關係中，尋求中國合作運動的發展。(6)本文特別是對信用、消費、生產各合作社的實態及其特色，依據新的事實更深入地實證分析。例如，像上海合作銀樓等是一直未被人們知道的合作社，我則努力進行發掘考察。

本文認為從一九二〇年以後開始正式宣傳合作運動，一九二一年間涌現出各種合作社，一九二二年以後消費合作社成為主流。這些合作社在一九二四年走向了瓦解。其理由有：民衆的經營能力不足與農業國家的中國不適應都市型消費合作社。此外，軍閥政府認為合作主義是“危險思想”而加以鎮壓。這一點是不應該忽略的。合作主義者為了打開局面，逐漸放棄獨立的立場，與國民黨合流。他們在進行自己實踐的同時，在國民政府下為合作社飛躍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中國棉紡織業改變時期的市場結構

森 時 彥

一九二三年經濟蕭條以後，中國棉紡織業從初期發展階段進入一個改變階段。一九二三年以前，中國紗廠幾乎都是專門向農村傳統織布業供應二〇支以下的粗紗，但是經過“民族工業黃金時期”，隨着粗紗生產能力的飛躍發展，廣大農村的粗紗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因此，以日商紗廠為首的上海紗廠紛紛開始生產超過二〇支的細紗而對付一九二三年以後新的市場情況。

其結果是中國紗廠逐漸分為兩種類型，即以生產細紗為主的沿海先進紗廠和生產粗紗為主的內地落後紗廠。一九二二年開業的湖南第一紗廠是有代表性的內地落後紗廠之一。衆所周知，湖南軍閥統治的動亂往往阻礙其生產活動。但是，從一九二八年利益率超過三十%以後，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為止，它的營業獲得空前未有的好成績。在這一時期，不僅僅是湖南第一紗廠，其他內地落後紗廠也獲得非常優良的經營成績。我們不妨把這一時期稱做“內地紗廠的黃金時期”。我們要辨析的問題是，內地紗廠的“經濟繁榮”究竟為什麼一定是一九二〇年代後期出現的？

本文從一九二三年以後中國花紗市場結構的角度，來探討“內地紗廠的黃金時期”的形成原因。以上海日商紗廠為先導的細支化，到一九二〇年代後期才走上軌道。這種生產結構的變化，在棉花流通方面也引起了值得注目的急劇變化。以往在中國棉花市場上流通的華棉和印棉，只能用於生產二〇支以下的粗紗。要生產超過二〇支的細紗，就必須採購細長纖維的優良棉花。為了應付如此要求，日商紗廠通過日本三大棉花洋行採購大量的美棉。日商紗廠求購優良棉花並不僅限於外棉，在中國國內也到處伸手採購優良棉花。除了原來的三大棉花市場（上海，漢口，天津）以外，在鄭州，濟南，沙市等地形成了新的三大棉花市場。以靈寶棉為代表的所有優良棉花，通過這些途徑向上海運銷。中國棉花市場開始分為兩種類型，即供應優良棉花的新、舊三大市場和只能供應粗絨棉花的其他地方市場。

這樣，一九二三年以後中國市場在花紗兩個方面都從初期階段的單一結構變成雙重結構。本文認為，這種中國花紗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就是形成“內地紗廠的黃金時期”的重要原因之一。換句話說，內地紗廠的“經濟繁榮”是一九二三年以後中國棉紡織業生產結構改變的集中表現。